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53期）

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2年9月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53期

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53期

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

报告人：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2022年9月

目 录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 百年来东方明珠经历沧海桑田，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开埠至二战前：
与内地割离

1842-1945

1841年1月25日英军登陆香港岛，1月26日举行升旗仪式，香港开埠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

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1941-1945年间日本占领香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巨大破坏

二战后至改革开放之前：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45-1978

二战结束后，因逃避内战，内地人口、资金流向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香港转口贸易迅速发展

因朝鲜战争带来禁运，转口贸易受限；香港转而发展轻工业

1960年代以来，香港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电子、机械行业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与
内地相互成就

1978-2018

伴随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桥头堡

1980年代香港工业北迁，金融、服务业与房地产大发展；依靠“前店后厂”模式转口贸易也再次繁荣

1983年香港启动联系汇率制，加之高效自由的市场体系，香港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

1997回归之后与内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2008年之后FDI中源自香港的占比迅速上升

百年大变局：再定位、再出发

2018-至今

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冲突，大国博弈之下香港难以独善其身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暴发，扰动经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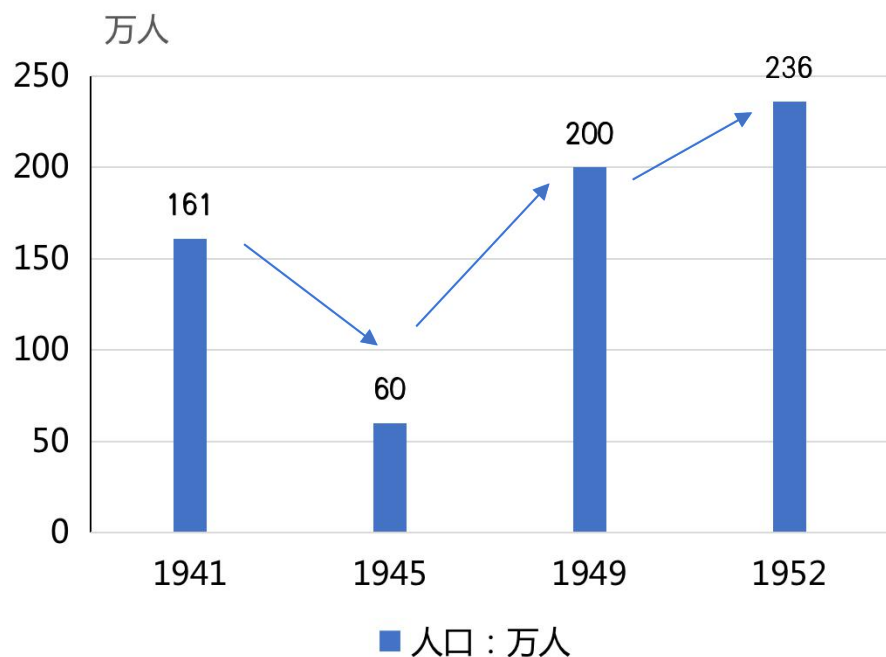
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香港经济收缩、优势削弱

香港经济需要再定位、再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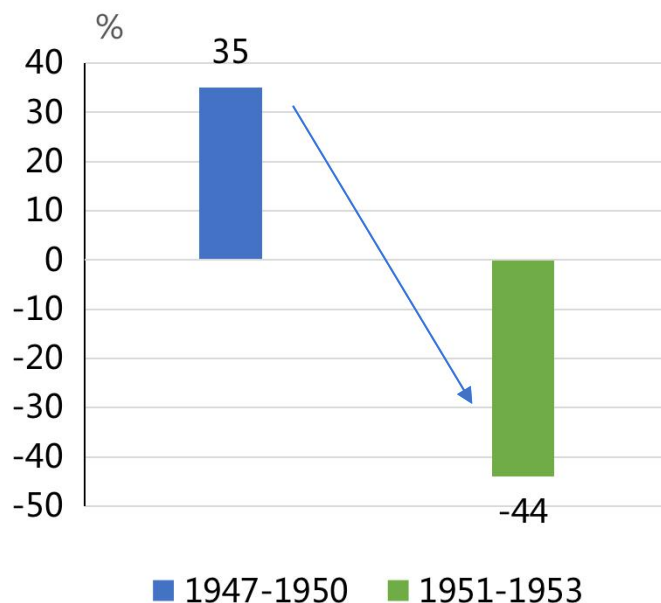
■ 1945至1978年，内地的人员、资本等要素流向香港，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 » 二战结束后“逃港”为香港带来大量的人口与资本：香港人口自1945年的约60万人左右上升至1952年的236万人，人口迁移规模史上少见
- » 1950年韩战爆发，欧美对中国采取禁运和封锁，香港转口贸易受到巨大限制，被迫转而寻求发展工业、制造业，并取得巨大成功；1962至1978年平均GDP增速达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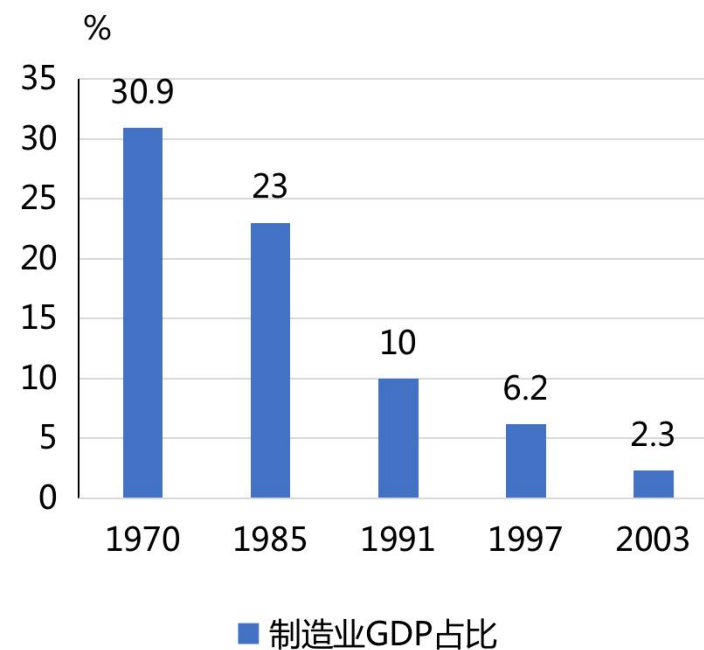
1949-1960香港人口快速增长



欧美对内地禁运使得香港转口贸易增速大幅下滑



香港制造业GDP占比曾达30%以上，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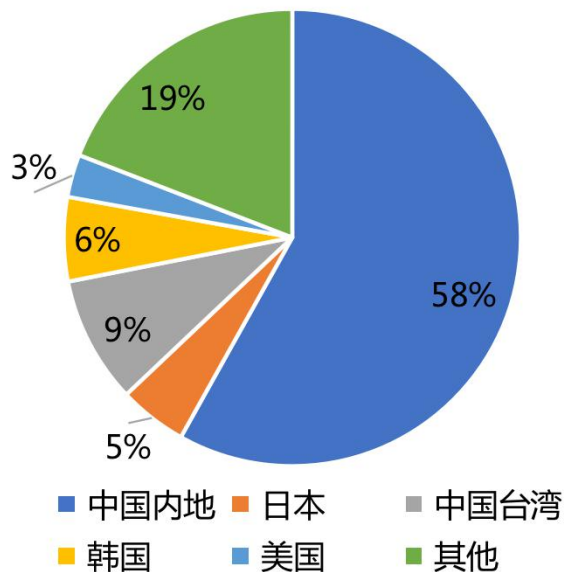
■ 1978至2018：香港依托内地成长为贸易、金融中心，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 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经济的二传手，改革之初内地引进外资总额中有超过80%来自香港；至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香港的占比约有7成
- 香港还是市场机制及管理经验的引入者；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前厂后店”，同时将香港及海外的管理、技术、运营及人才引入内地
- 源自香港的贸易、投资及资本帮助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自身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

内地FDI源自香港的占比较高



香港转口贸易主要来自中国 (2017)



香港为亚洲金融中心排名首位 (2009/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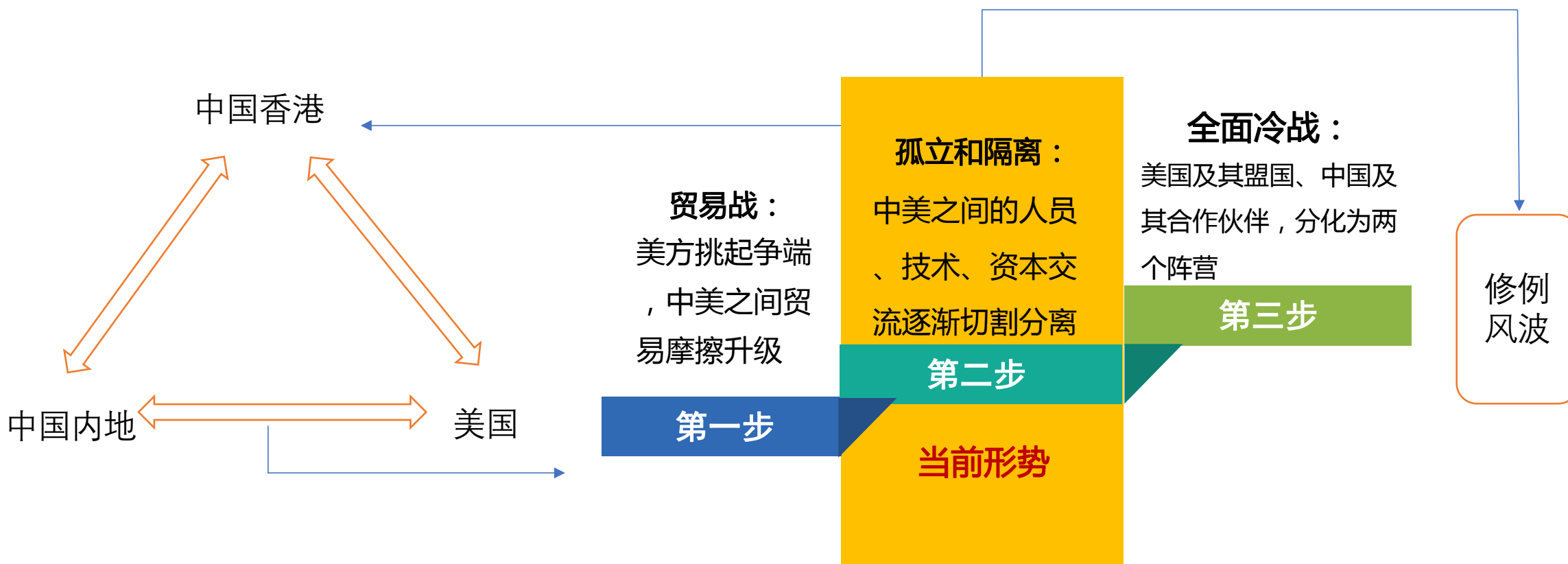
	亚洲排名 2009	全球排名 2009	亚洲排名 2018	全球排名 2018
香港	1	3	1	3
新加坡	2	4	2	4
东京	3	15	4	6
上海	4	35	3	5
台北	5	41	10	32
吉隆坡	6	45	12	40
曼谷	7	50	13	48
北京	8	51	5	8
首尔	9	53	11	33

注：资料来自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项目GFCI

■ 2018至今：中美博弈、修例风波及疫情三重叠加，香港的传统优势逐步削弱

➤ 大变局之下原有三方关系失衡，香港因“联系人角色”而受到一定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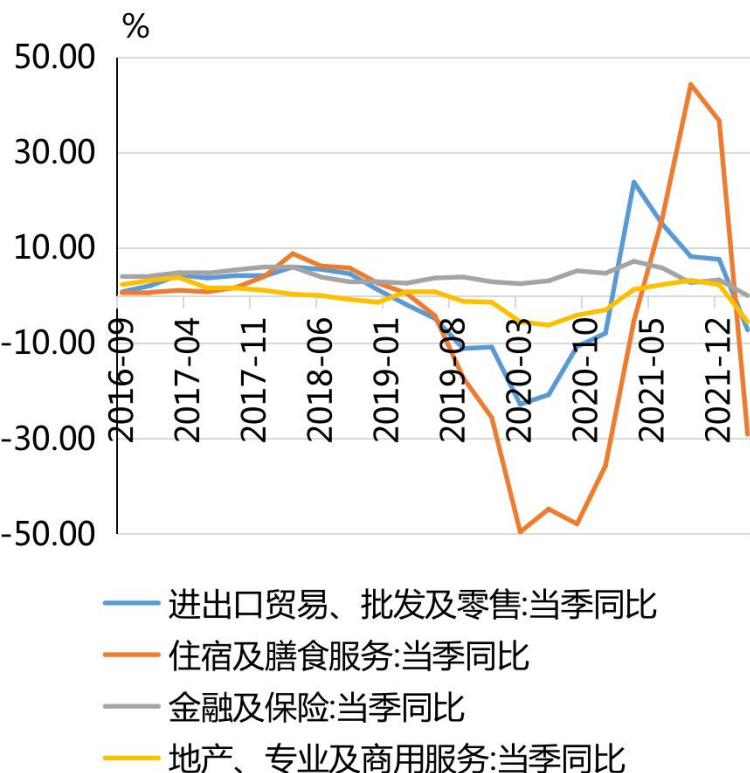
» 在中美关系缓和时期，香港作为内地与外部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从中受益，且内地越“封闭”，香港的作用就越突出；随着2018年美方挑起贸易冲突，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修例风波涌现，内地需要对香港加强管控、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



➤ 疫情下香港“尴尬”凸显：海内外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导致香港疫情防控进退两难

- » 疫情冲击之下香港贸易、旅游、金融及地产四大支柱服务行业皆面临显著收缩压力
- » 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具有与海外及内地恢复通关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一度面临“动态清零”的压力

香港支柱行业皆受疫情冲击



香港入境政策居于内地与海外之间，逐步向海外靠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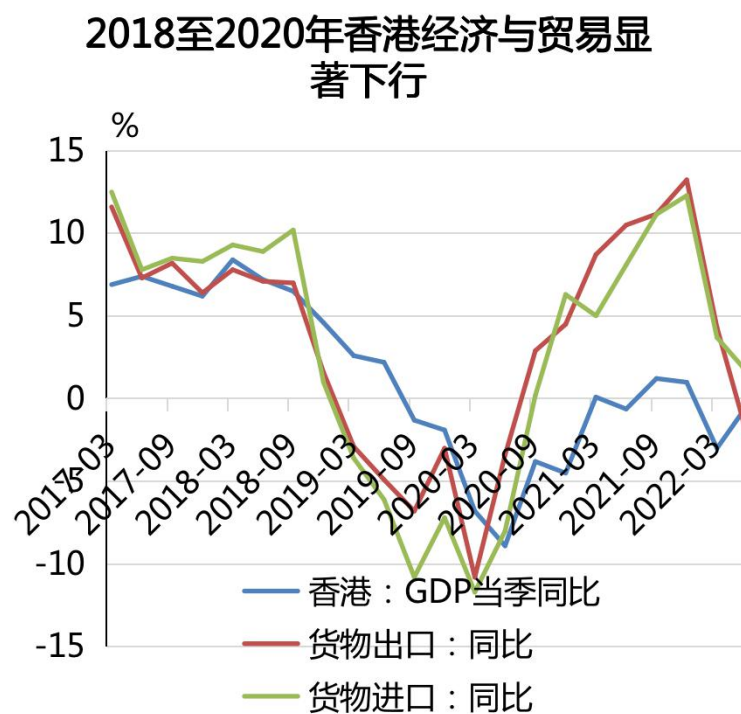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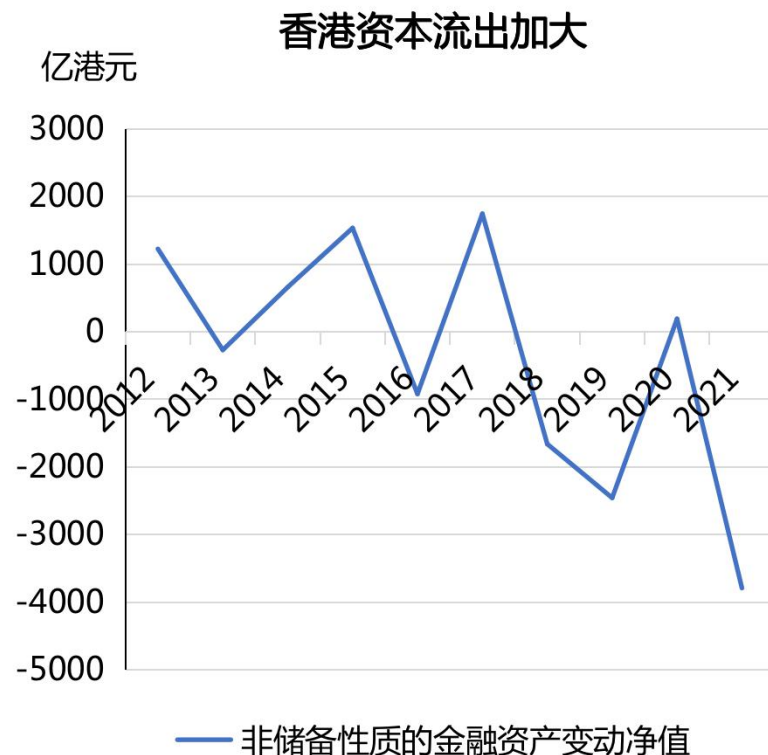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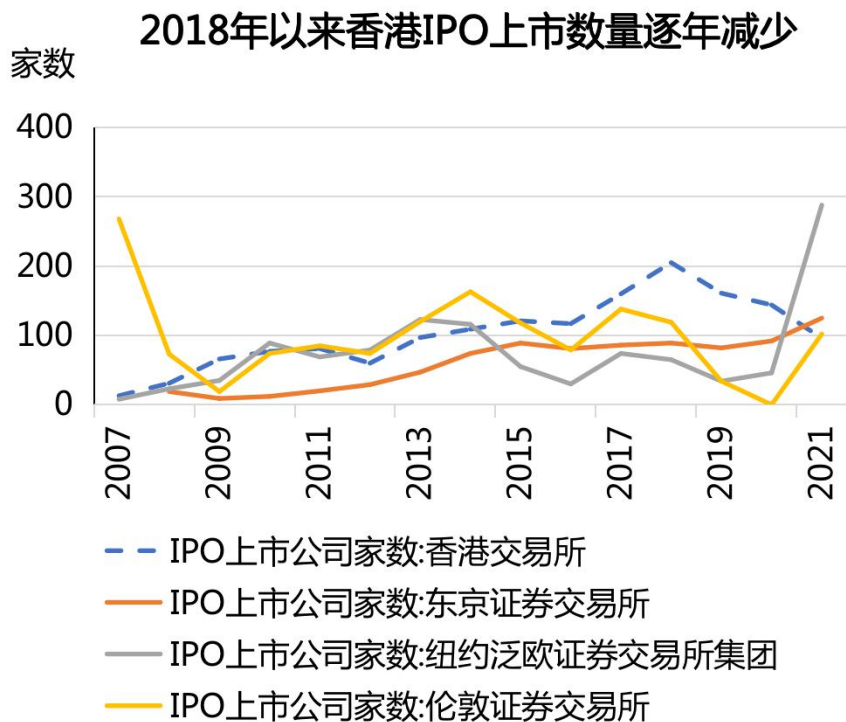
内地入境	香港入境	新加坡入境
2021年各地先后执行入境“14+7”政策 2022年6月调整至“7+3”	4月宣布放宽航班熔断机制门槛，允许非港人入境 8月缩短强制隔离时间，执行“4+3” 9月23日宣布，26日起机场入境检疫改为“0+3”，登机前无需取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月起只要接种疫苗并提供核酸证明，不用隔离，韩国、日本、泰国及欧美等国均先后放宽入境限制

疫情以来新加坡、香港竞争加剧

- ❑ 德意志银行宣布将亚太地区总部从香港迁至新加坡
- ❑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数据，2020年新加坡有约200个家族办公室成立，办理人数暴增3倍
- ❑ 相关媒体报道2022年以来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新加坡
- ❑ 2022年全球金融中心(GFCI)排名，新加坡超过了香港

■ 传统优势逐渐削弱，香港经济路在何方？

- » 从经济增长上来看，2018年以来经济增长表现疲弱；如果考虑疫情期间的两年符合增速，2019年至今香港总体为负增长；人口也呈净流出状态
- » 从金融中心地位上来看，香港IPO数量逐年减少，资本流出有所加大，金融中心排名被新加坡超越
- » 从贸易规模上来看，2018至2020年间的贸易同比也呈显著下行，且随着中美博弈及欧美加息，贸易增速下行压力不减



目 录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香港新的历史使命、历史机遇，有利于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

-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大国博弈持续，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同阵营之间的分裂，逆全球化加剧，以往支撑香港发展的全球化、资本全球范围内流动等优势弱化
- » 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中国面向国际的窗口和桥梁，在大国博弈、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加大，但香港也有其独特优势



■ 优势一：《国安法》落地，香港开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新征程

- » 虽然部分西方国家意图借《国安法》借题发挥攻击中国，但国安法的颁布是“定海神针”，结束了扰乱香港经济运行的政治纷争，有力确保了香港社会稳定，使得香港能准确定位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且使得香港进一步获得内地信任，有利于与内地开展更多合作

“修例风波”导致香港经济出现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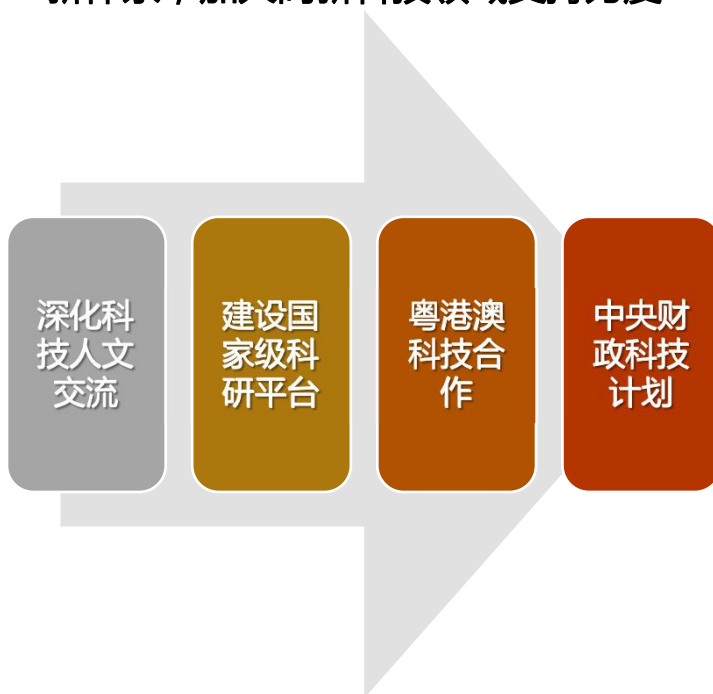
■ 优势二：中国着力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香港是内、外循环的重要交接点

- » 中国着力发展内循环，加大对“卡脖子”领域科技的支持力度，为香港发展科创产业提供了机会
- » 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仍然是全球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继续加大改革开放，香港仍然是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内地的重要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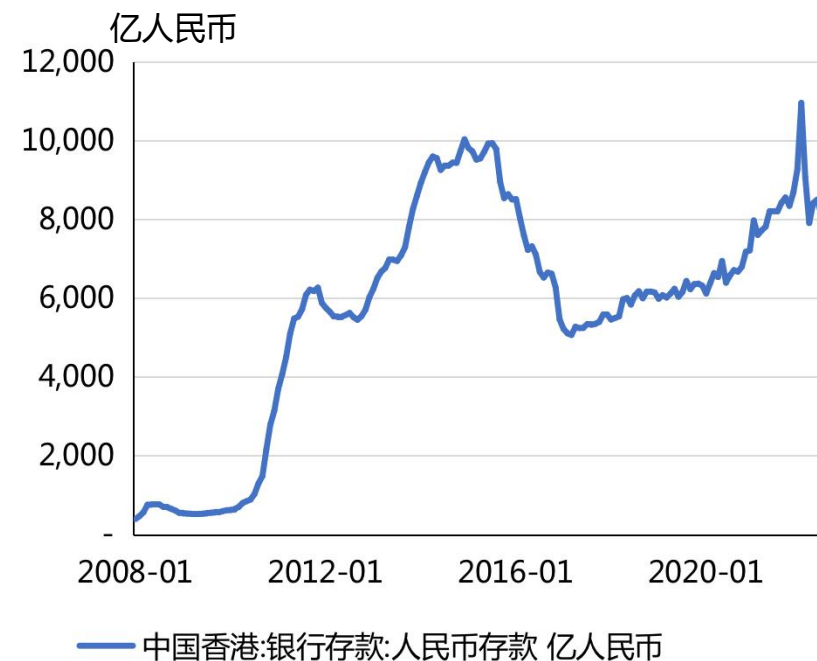
大力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大循环

- ◆ 1997-2021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由**507.7亿美元**增至**3603.3亿美元**，增长了**6.1倍**，年均增长**8.5%**。
- ◆ 1997-2021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投资超**1.4万亿**美元，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量的**57.6%**。
- ◆ 1997-2021年，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超**8千亿美元**，占内地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53.2%**。
- ◆ 香港起到**全球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是外循环的重要交接点。

“四大举措”鼓励香港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加大高新科技领域支持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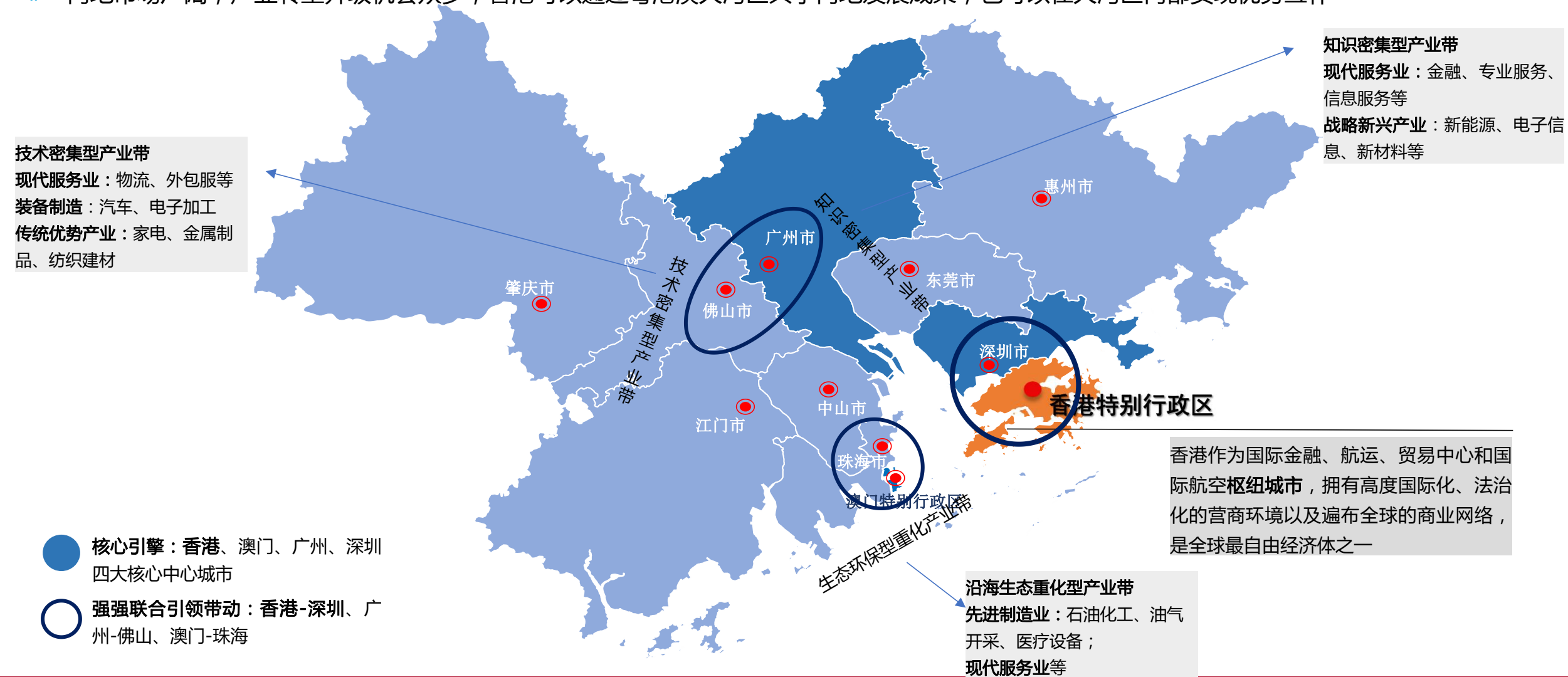


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香港人民币存款呈上升趋势



■ 优势三：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可进一步融入内地经济发展

» 内地市场广阔，产业转型升级机会众多，香港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内地发展成果，也可以在大湾区内部实现优势互补



■ 优势四：香港法制建设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依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自由经济体

- » 香港实施普通法系，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如为申请财产冻结令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建立了一整套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 目前香港税制简单，近三年来香港的宏观税负仅为11%左右，而同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宏观税负分别为15%和21%

香港实施普通法系，法治建设全球领先

- ◆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下，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易与国际接轨
- ◆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管治指标》，2021年香港法治仅次于新加坡位列亚洲第2、全球第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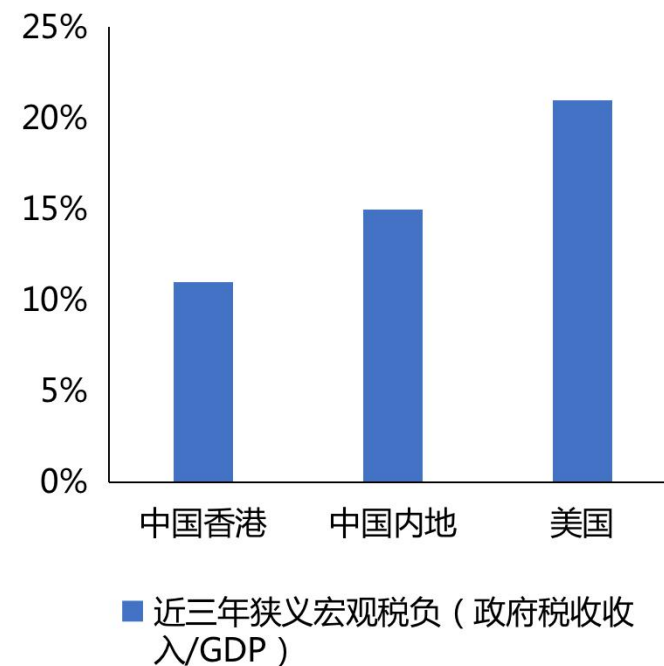
香港产权保护制度完善

- ◆ 注重私有产权保护，如为申请财产冻结令（Mareva Injunction）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 ◆ 建立综合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条例完善，包括《版权条例》、《商标条例》、《专利条例》等

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自由经济体

- ◆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亚洲第二、全球第五
- ◆ 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香港位列全球第一

香港税负水平处于全球偏低水平



*注：《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前五名分别为丹麦，瑞士，新加坡，瑞典，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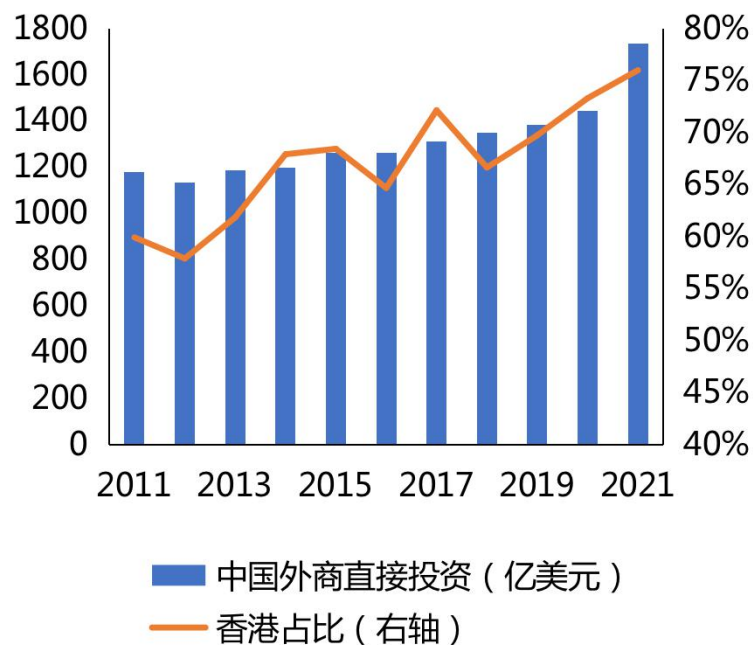
■ 优势五：香港是内地与西方文化交流、资本流动的窗口和桥梁

- » 香港文化贯穿中西、特色鲜明，国家“十四五”规划表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 » 香港资本市场背靠内地、面向全球，是内地与西方资本流动重要窗口，近年来海外资本通过香港地区加速进入我国

香港是内地与西方资本流动重要窗口

- ◆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日益增多，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超140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超60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处
- ◆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持续推进，有利于提高外资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外资通过香港地区加速进入我国



香港文化贯通中西



■ 依托自身优势，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实现香港经济再定位

香港经济再定位

继续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好中国与国际交流的窗口

建设成为重要的科技产业区，打造“**金融+科创**”双引擎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作用，与区域协同发展

发挥**内、外循环交接点**优势，既参与国内循环，又参与国际循环

目 录

-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面临或两种不同情境，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定信心推动香港发展

- » 面向未来，无论形势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在中国经济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补短板以及全面实施基本法、国安法和本港普通法的背景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均拥有独到优势，应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未来大国博弈或有两种情境

情境一

中国与西方虽然存在分歧与博弈，但仍保持经贸层面的联系，不会完全脱钩

情境二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博弈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完全脱钩与“新冷战”，美中及各自盟友形成两个阵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上进行对抗

■ 坚定落实“一国两制”，这是香港发展最根本、最核心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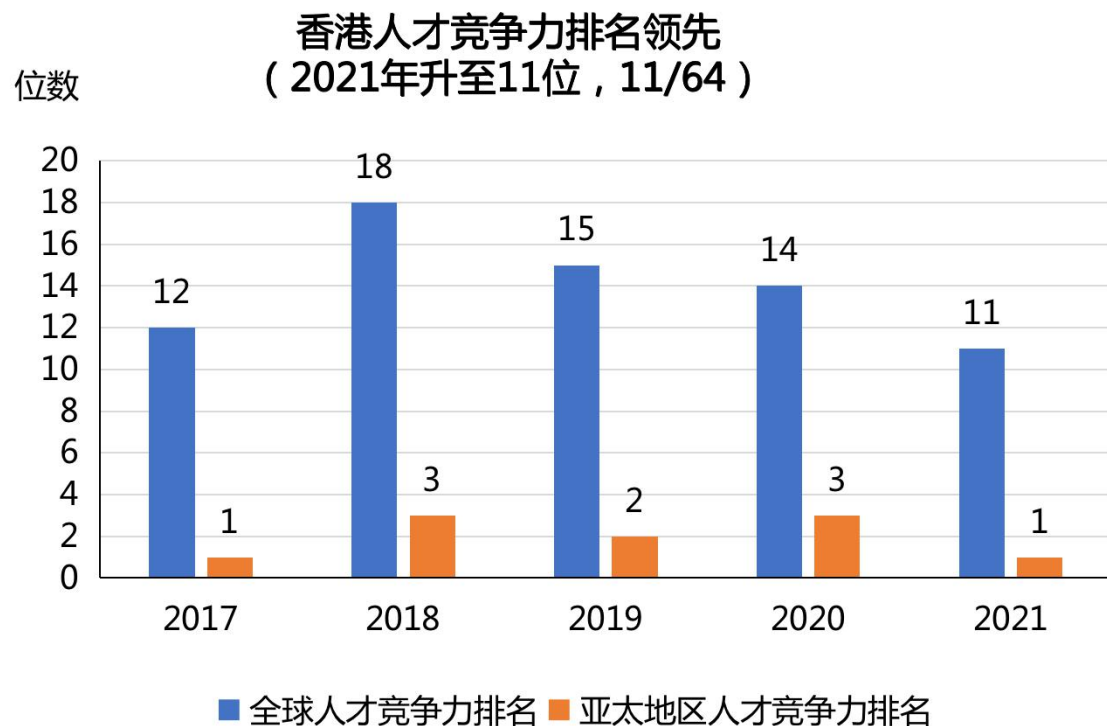
» “一国两制”是港澳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是香港拥有一切其他优势的基础和前提，要继续毫不动摇的坚持“一国两制”

- ✓ 在“一国”的框架下，香港能充分拥抱国内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度参与内地经济内循环，有效把握中国经济补短板、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
- ✓ 在“两制”的制度设计下，香港保留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稳定民生，拥有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接轨的普通法法治体系



■ 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大湾区硅谷”，回补亚洲四小龙时代的荣光

» 利用人才、制度以及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连的优势，发展科创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与粤港澳协同发展，回补亚洲四小龙时代的荣光



金融、贸易等传统支柱产业



科创产业



■ 北部都会区开发要加大与深圳基础设施的连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

- » 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其他城市与香港的人员、资本流动，将北部都会区开发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结合，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枢纽与产业集聚枢纽
- ◆ 当前北部都会区与深圳相比，经济业态与区域功能已经显著落后，后续建设应利用好靠近深圳的优势，加强与深圳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
- ◆ 促进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人员、资本流动，吸收国际以及深圳的科技企业入驻，利用湾区相对完备的产业链形成联动效应，推动深港经贸一体化
- ◆ 以科创产业为翘板，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及“工业4.0”与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尤其是发挥好自身医药等领域的研发优势



■ 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 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香港在全国的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将全国范围纳入招生考量
- » 当前香港在校生人数仍然偏少，与大陆教育重镇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依然偏低，高等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前100名中有5所来自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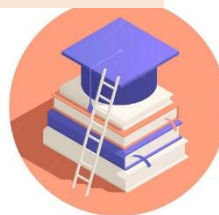
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

22	香港大学
34	香港科技大学
39	香港中文大学
53	香港城市大学
66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武汉、广州高校在校人数（2021）

	高校在校人数	高校在校生占总人口比重
香港	30.7万	4.1%
武汉	128万	9.4%
广州	155.8万	8.2%

建议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高等教育，短期内将高校在校生人数提升至50万，未来提升至80-10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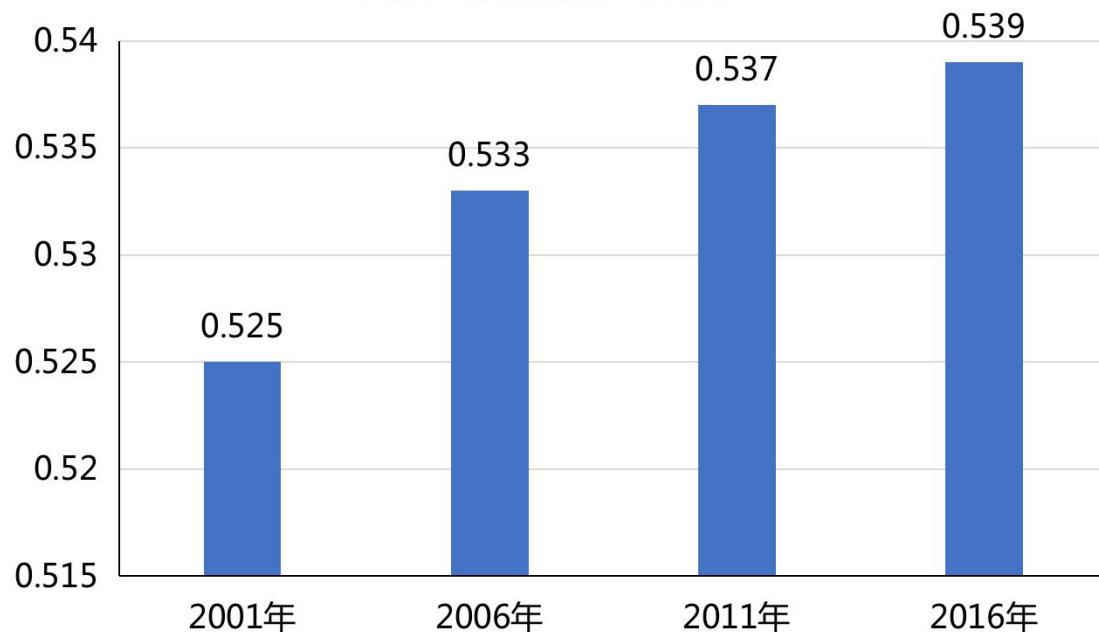
■ 政府要积极有为，做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 » 港特区政府应按形势发展适当转变自身角色，从单纯的有限政府转成为「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尊重市场，同时也要更好发挥引领作用

“有限政府”+“有为政府”

- ✓ 加大改善民生力度，更快更好解决土地问题、住房困难、收入分化等问题，加大经济发展动力
- ✓ 发挥好香港文化荟萃中西的优势，出台措施支持香港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 ✓ 特区政府应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目标提出者」的角色，提升北部都会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以引导高端制造业发展为主线，加快推动香港经济结构转型

香港基尼系数多年高于0.5



注：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0.2-0.29表示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
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
2、图中统计口径为原住户收入

□ 结语

- » 香港历经百余年历史沧桑，但并未因此沉沦，反而成为东方之珠，香港是不死之鸟、九命之猫。
-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持续，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同阵营的分裂，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香港要敢于面对挑战，抓住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辱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与责任。
- »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妥善应对，香港不仅能发展，还能发展得很好。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国博弈、逆全球化的非常态终将过去，未来香港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出东方之珠的独有风采。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9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3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证券时报、中证金牛座、WIND、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二十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香港经济的重新定位”，政界、学界、企业界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巴曙松、曹二宝、陶冬、乔虹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一、香港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

自开埠至今，香港经济几经沉浮，在时代的浪潮中，走出了自己具有特色的发展之路。而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经济的发展也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回望历史，香港经济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埠至二战前（1841-1945年）：彼时香港与内地呈割离状态。香港在

开埠之前只是一个渔村，鸦片战争后被割（租）让给英国，成为英国侵略内地的跳板和港口。其中，1941 年-1945 年日本占领香港，更是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第二阶段为二战后至改革开放前（1945-1978 年）：内地的人员、资本等要素流向香港，助力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二战结束后的“逃港”潮导致内地大量人口与产业资本流向香港，其中香港人口自 1945 年的约 60 万人左右上升至 1952 年的 236 万人，期间每年新增人口约达 30 万人。1949 年之后，随着新中国成立，作为内地与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香港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但是，随着 1950 年韩战爆发，美国牵头对中国采取禁运和封锁，香港转口贸易受到巨大限制，香港被迫转而寻求发展工业、制造业，在前期人口、产业资本快速增加等有力因素的支撑下，香港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电子、机械等行业取得了迅速发展，1962 至 1978 年香港平均 GDP 增速达 13.6%，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后（1978-2018 年）：香港与内地互相成就期。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贸易和金融产业快速发展。香港金融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1997 年的 10.4% 快速升至 2018 年底的约 20%（19.8%）。同时，香港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桥头堡，对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之初，内地引进外资总额中有超过 80% 来自于香港。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前厂后店”模式开启，同时将香港及海外的管理、技术、运营及人才引入内地，源自香港的贸易、投资及资本帮助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自身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

第四阶段为 2018 年至今：中美博弈、修例风波以及疫情三重叠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经济需要再出发、再定位。2018 年以来，中美博弈、修例风波、新冠疫情三重冲击叠加，香港的原有部分优势逐渐削弱甚至逆转。首先，大国博弈大变局下，原有的内地-香港-美国三方关系失衡，香港联系人角色受到冲击。关于中美博弈，我曾有一个判断，认为中美博弈或存在“三部曲”，第一步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第二步美国要在人员、技术、资本、交流等方面逐步与我国切割分裂，第三步逐步形成“新冷战”，全球分化为两个阵营。目前来看，情况或正朝着当初的预判方向发展。在

中美关系缓和时期，香港作为内地与外部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从中受益，且内地越“封闭”，香港的作用就越突出，但随着 2018 年美方挑起贸易冲突，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修例风波涌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美国原有三方关系失衡，香港“联系人角色”的地位受到冲击且逐渐削弱。其次，应对疫情冲击香港面临的“尴尬”局面凸显：海内外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导致香港疫情防控进退两难。疫情冲击之下，香港贸易、旅游、金融及地产四大支柱服务行业皆面临显著收缩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具有与海外及内地恢复通关的强烈需求，而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一度面临“动态清零”的压力。最近香港调整防疫政策，在兼顾国内政策的基础上，尽量与国际接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举措。

目前看来，香港的传统优势在逐渐削弱。从经济增长上来看，2018 年以来经济增长表现疲弱。如果考虑疫情期间的两年复合增速，2019 年至今香港总体为负增长，并且人口也呈净流出状态。从金融中心地位上来看，香港 IPO 数量逐年减少，资本流出有所加大，金融中心排名被新加坡超越。从贸易规模上来看，2018 至 2020 年间的贸易同比也呈显著下行趋势，且随着中美博弈及欧美加息，贸易增速下行压力不减。经历了长时期繁荣的“东方之珠”需要认真思考破局之道。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仍具备特殊优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大国博弈持续，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同阵营之间的分裂，逆全球化加剧，以往支撑香港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等优势弱化。但是也要看到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中国面向国际的窗口和桥梁，在大国博弈、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虽有所加大，但香港也有其独特优势：

第一，《国安法》落地后，香港开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新征程。虽然部分西方国家意图借《国安法》借题发挥攻击中国，但国安法的颁布是“定海神针”，结束了扰乱香港经济运行的政治纷争，有力确保了香港社会稳定，使得香港能准确定位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且使得香港进一步获得内地信任，有利于与内地开展更多合作。

第二，香港是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交接点，在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着重要优势。一方面，当前中国着力发展内循环，加大对“卡脖子”领域科技的支持力度，为香港发展科创产业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仍然是全球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继续加大改革开放过程中香港仍然是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内地的重要窗口，是中国着力推动外循环的重要支撑点，这是香港新的历史责任和新的历史机会。

第三，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可进一步融入内地经济发展。内地市场广阔，产业转型升级机会众多，香港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内地发展成果，同时也可以在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同时保持各自原有的制度体系，在大湾区内部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香港的法制建设仍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依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自由经济体。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下，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易与国际接轨，当前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主要位于实施普通法的地区。同时香港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如为申请财产冻结令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建立了一整套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等。此外，香港税制简单，近三年来香港的狭义宏观税负（政府税收收入/GDP）仅为11%左右，而同期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宏观税负分别为15%和21%。

第五，香港是内地与西方文化交流、资本流动的窗口和桥梁。香港文化贯穿中西、特色鲜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香港资本市场背靠内地、面向全球，近年来海外资本通过香港地区加速进入我国，是内地与西方资本流动的重要窗口。

在这种大背景下，香港经济再定位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一是要继续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好中国与国际交流的窗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法被国内其他任何城市取代，对这一点要高度重视、合理运用；二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重要的**科技产业区**，打造“金融+科创”双引擎；三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作用，与区域协同发展，要敢于提出香港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的龙头**；四是发挥内、外循环交接点优势，

既参与国内循环，又参与国际循环。

三、强化底线思维，做好香港经济再定位

做好香港再定位的核心是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进一步认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便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均可以助力香港立于不败之地。面向未来，大国博弈大概有两种情境：一种是中国与西方虽然存在分歧与博弈，但仍保持经贸层面的联系，不会完全脱钩。情境二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博弈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完全脱钩与“新冷战”。以情景二为底线或更能厘清对未来香港定位的思考。在上述情景下，实现香港经济新定位可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落实“一国两制”，这是香港发展最根本、最核心的优势。“一国两制”是港澳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是香港拥有一切其他优势的基础和前提。在“一国”的框架下，香港能充分拥抱国内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度参与内地经济内循环，有效把握中国经济补短板、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在“两制”的制度设计下，香港保留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稳定民生，拥有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接轨的普通法法治体系。

二是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大湾区硅谷”，回补香港亚洲“四小龙”时代的荣光。对于海外科学家，香港在知识产权、上市制度对资本收益的安排、对信息的管控方面具备自身的优势，香港利用人才、制度以及与内地市场紧密相连的优势，发展科创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大有可为。同时，北部湾区为香港发展科创和高端制造业提供了相关条件，可将其打造成为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区域，吸引科创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入驻香港，最终使香港形成一个高密度的科研开发区和科研产业区，这是香港的历史机遇，也是香港回补“四小龙”时代荣光的重要历史契机。

三是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香港在全国的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将全国范围纳入招生考量**。并且当前香港在校人数仍然偏少，与大陆教育重镇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依然偏低，高等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必须大力发展高等

教育事业，短期内力争将高校在校生提升到 50 万人，中长期提升到 80 万至 100 万人，这将为香港创新、为香港吸引国际人才落地提供载体。

四是政府要积极有为，做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香港特区政府应顺应形势发展，适当转变自身角色，从单纯的有限政府转成为“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既尊重市场，同时也要更好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大力度改善民生，更好的解决土地问题、居民住房、贫富差距等问题，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发挥香港文化荟萃中西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准确认识香港定位的转换，积极推动实施完成香港经济结构转型。

香港历经百余年历史沧桑，但并未因此沉沦，反而成为东方之珠，被称为“不死之鸟、九命之猫”。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香港要敢于面对挑战，抓住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深度拥抱、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继续承担中国面向世界窗口角色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科创产业，不辱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与责任。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妥善应对，香港不仅能发展，还能发展得很好。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国博弈、逆全球化的非常态终将过去，未来香港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出东方之珠的独有风采。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香港经济当下面临的挑战，未来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讨论。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于香港金融业先后公布了五项支持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些香港原有功能的发挥在继续强化和改进，**香港新的独特的功能，新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慢慢显出雏形**。此外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香港具备独有的优势，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它又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国际化首选肯定是在香港**。

面对新形势，香港市场在重新探索方向的过程中还具备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香港市场的深度、产品多样性、专业人才的丰富性还是有它的优势和韧性的**。未来随着相

关防疫政策调整，香港市场的表现还会有所回升。另外香港市场平稳承接中概股回归上市，对冲了风险，发挥了在国际政治压力紧张时期的风险缓冲功能。

未来香港市场还需要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真正把握中国的需求，同时按照国际水准来提供解决方案。其次，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香港要对冲脱钩，推动金融、经贸、文化方面再挂钩。最后一点，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是滞后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我国金融体系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这也是香港将来大有可为之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对香港本身依然还要从全局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第一，对于香港的汇率制度的调整，不仅仅决定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取决于香港在世界体系中的桥梁作用。世界经济体系在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以及香港本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分工体系、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是决定香港汇率制度的几大因素。第二，香港产业的重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取决于在整个世界价值链、产业链的格局。

必须要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思考香港的地位，学习着眼印太时代的再定位来考虑香港的功能。同时也需要看全球各种产业以及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尤其是未来金融功能深化的这种趋势，还要从整体城市的竞争力布局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对于香港城市的新定位一定要符合金融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大转型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服从世界科创中心、世界前沿技术生产中心演进的规律。

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乔虹指出上半年香港经济相对低迷，2022年GDP增速预期为-1.5%，但明年经济增速会有所反弹。这一判断首先是基于香港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入境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通运输从7月份开始也有了好转的迹象。进入2023年，香港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外需和金融条件。可能出现的利好消息有以下三点：第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渐放开，会使得香港和国际重新接轨，这对香港的服务行业有很大的促进；第二，除了和内地通关的日程能够逐渐明确外，香港居民海外旅游消费也会对经济有一定贡献；第三，未来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政策调整可能会对香港经济的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陶冬**从财富管理的角度分析香港经济的定位。近年来来往新加坡建立家族办公室的人有很多，这是出于未来自己发展的角度、风险分散角度、战略投资方向的角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家族办公室的建立需要等待的时间较长，因为新加坡相关的高端金融人才和辅助性工作人员的储备不够。与之相比，香港良好的交通区位与投资基础设施是保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会被轻易撼动的重要条件。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首先要做到的是务必保持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单纯成为中国另外的一个城市。在保持人才优势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资本市场体系。此外在香港的定位上双轮驱动是必须的，一是中国的香港，二是国际的香港。与内地紧密结合，坚持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两点缺一不可。

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曹二宝**指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香港体现得非常鲜明，而且经历了经济、金融、政治的风波，香港的独特优势确实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内地各城市都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对于香港经济新定位，需要从三个角度看：首先，香港是处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它的地位是“国之重器”、“一国两制”。其次，国家需要香港，不管香港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用举国之力来成就香港。最后，要落重锤，把眼光脚步投资的重点落到香港去，来建设资本主义香港。

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要把握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两个建设好”，这是“一国两制”里程碑式的思想，它标志了“一国两制”不仅是统一祖国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祖国的方针。让香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场。尊重两制差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前提，求大同存大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硬核，两个建设好就是善用两制之利的总要求。

刘元春：将香港打造成未来国际金融引领者和国际 风险定价者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53 期）上的发言

最近五年中，香港经济何去何从的话题已有很深入的讨论。2020 年国家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过程中，香港如何进行未来五年的规划，大陆学界和香港学界都有很多争论。当前对于香港经济地位和战略定位的讨论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在目前大国博弈的状态下，特别是在全球滞胀的时代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何去何从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因为美元急剧加息，联系汇率本质上会丧失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港币加息毕竟要全面跟进美元加息，**这种加息持续下去是否会导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异、影响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走向，大家很焦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近期很多参数与大家预期的参数有很多差异，目前香港的贸易量、金融增长速度、GDP 增长速度的确也会让外界对其下一步调整遵循的新规律更加关注。

如果我们把近期对香港的忧虑放在一个更长远的阶段，就会发现，从中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这些担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2018 年深圳 GDP 超过香港，2017 年新加坡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香港，2018 年新加坡 GDP 首次超过香港。与此同时，洛桑学院在近两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持续下调了香港的城市竞争力。2017 年香港排名世界增长竞争力第一位，去年已经回落到第七位，这使得大家对于香港传统地位的变化、未来的定位和转型也是高度关注的。**对于香港的未来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呼吁是香港应该向大湾区进行全面靠拢，在科创上进行全面重构，形成科技金融的新模式。**

这样一些着眼于当下面临问题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对香港本身依然还要从最全局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香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中，香港有过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盯住英镑自由浮动以及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时代。**汇率制度的调整，不仅仅决定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取决于香港在世界体系中的桥梁作用。**对于下一步香港汇率制度的变化，依然取决于世界经济体系在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以及香港本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分工体系、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位置。

第二，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并不是纯粹以金融作为核心，香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后来的事情。在六七十年代，香港 GDP 比重中制造业曾经达到过 30% 的水平，最新的 GDP 比重中香港制造业只达到了 0.6%、0.8% 的水平，**这一变化说明，香港产业的重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取决于整个世界价值链、产业链的格局。**从这些角度进行梳理，就会发现有几大重点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必须要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思考香港的地位，学习和着眼印太时代的再定位来考虑香港的功能。**同时也需要结合全球各大产业以及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尤其是未来的金融功能深化的趋势，还要从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布局来思考这几个问题。

对于第一点，最为明显的是在俄乌冲突之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到一个加速演变期。世界经济从 2008 年以后形成的三角模式，也就是美国、欧洲、亚太区域特别是印太区域的 GDP 各占全世界的 25%，这是一个“三分天下”的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在 2018 年以后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 GDP 按现行汇价在去年已经超过整个欧盟的总量，另外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会看到：**第一，大国间冲突主导世界未来的格局已经开始全面显现，已不是简单的三角博弈；第二，印太时代已经全面到来，**根据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在 2025 年从目前 25% 左右的水平下降到 22%，但是印太区域占全球 GDP 比重将会上升到 34%-35%，欧洲板块可能会跌破 20%。**因此在中美博弈中，香港能否成为大国博弈间的桥梁值得我们关注。在冷战时期毫无疑问香港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并且越是在相互对抗脱钩、出现剧烈鸿沟的时期，这种“桥梁效应”越会显现。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格局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香港能不能继承传统冷战时期的“桥梁效应”，在新冷战时期依然起到桥梁的作用。

对于印太时代的到来，新加坡和香港作为印太区域的核心金融资源的配置枢纽，两者在印太区域战略博弈中发挥“桥梁效应”的大小是需要考虑的。因为从 2020 年起，新加坡所经营的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是 3.4 万亿美金，而香港为 3.1 万亿美金，但是两者在金融资产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香港市场上，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 6.1 万亿美金，是其 GDP 的 17.8 倍；但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为 6526 亿美金，只有香港的十分之一。所以香港与新加坡在资产管理定位以及金融资源整合的定位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分工和变异。未来在这种新格局里，他们在制度上的优势以及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占据的优势，哪一点优势更为显著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

最后一点，如果单纯地把地缘政治因素、逆全球化的因素剔除掉，只考虑金融本身的发展，可以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新的体会：那就是一个“飞地”作为世界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它所具有的一项很重要的功能是桥梁和交易中转运站的功能。能否做到真正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对前沿风险进行全面的定价、全面的引领，是决定金融中心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一个金融中心主要是一般的金融交易，比如结汇、私人财富管理，而没有与最前沿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产边界扩展所产生的风险定价密切联系，这种金融中心注定会衰落。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和生产力前沿的结合程度分离，最终会导致失去定价权和风险控制能力。

从这个逻辑可以看到，纽约地位在超越伦敦地位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纽约代表了美国的生产力前沿。因此在打造香港为金融中心的同时，也应该打造香港高端产业的中心，使它们能够相得益彰，从而使香港真正成为未来国际金融引领者和国际风险定价者。但事实上，这种创新释放风险定价和金融中心的全面结合，不仅仅需要前沿技术的突破，需要前沿技术在商业化转型中场景的实现；另外还需要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城市竞争力，包括城市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的控制。在这些年里，香港最为失败的应该是它的城市成本特别是生活成本过高，尤其体现在它的房地产政策以及政府财税体系的构建上，与它新的定位存在着严重冲突。因此我们会看到，香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科技人才的汇聚中心，其向科创中心、先进科技和前沿科技产业方向的转化实际上会很漫长，简单地按照深圳和内陆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来进行复制，有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思维。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科创中心，特别是这种世界顶级人才的荟萃，不可能是多元

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化的。

因此，我们在未来科创中心的构建上不能简单化，产业和商业的结合需要城市资源禀赋来支持。香港城市的新定位一定要符合金融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大转型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服从世界科创中心、世界前沿技术生产中心演进的规律。

曹二宝：香港经济新定位，优先“国家所需”，善用“香港所长”

曹二宝 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曹二宝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3期）上的发言

香港回归25年来，经历了无论是经济、金融，还是政治风波，“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都展现得非常鲜明。它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确如国家领导人说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都难以比拟和替代的”。习近平用了更肯定的语言：“不可替代”。谈三点思考。

一、聚焦：“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精准结合

香港经济不是地方经济，也不是区域经济，更不是独立经济体。它的经济定位，就不能只考虑香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将它比对广东省、上海市等地方经济，或者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而应该是“一国两制”下的“国之重器”。“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内地或大陆（邓小平称为“国家主体”）实行“一制”，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另一制”。这就是内地任何地方如广东省、上海市等，或任何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同香港都没法比拟的，准确说没有可比性。所以，思考香港经济新定位，就需聚焦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来。

1、“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的最大亮点

首先要清晰地看到，香港回归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成功的最大亮点是什么？主要是三个：

1) **自由港**。全世界自由港130多个，最成功4个，亚洲2个，其中一个就是香港。

2) **单独关税区**（非主权地区有主权国家的海关税收政策）。这是 WTO 框架下的创造，全世界只有4个，中国就占了3个：香港、澳门和台湾，最成功香港。

以上两个最大亮点，就是史称“十二条”的中央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政策（1983年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其中第六条的重要内容。

3) 第三个亮点，是香港三个传统优势，即**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简称“三大中心”），得到了保持和巩固；期间又形成和发展出了八个新定位。

2、“三大中心”由中央提出和保障至今；八个新定位由国家规划“港澳专章”陆续提出和支持发展

1) “三大中心”也是“十二条”首次提出的，至今快40年了。其中有28年半，一直是香港经济定位的唯一表述或“标配”，大家耳熟能详。

这28年半包括：中英谈判2年半（1982年9月-1984年12月）：“三大中心”见之于“十二条”（1983年4月）和阐明“十二条”的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9月草签、12月签署、1985年5月生效）；香港过渡时期前半段5年（1985年5月-1990年4月）：“三大中心”见之于保障“十二条”实施的香港基本法（1990年4月）；过渡时期后半段7年（1990年4月-1997年6月）：“三大中心”见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委会和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文件；香港回归最初14年（1997年7月-2011年3月）：“三大中心”见之于“九五”、“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

2) “九五”开始提及港澳，因为香港回归在即（1996年3月），但香港的经济定位，回归后连续3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仍是“三大中心”。最大的变化始于“十二五”（2011年3月），就是香港回归14年前夕，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开始为港澳设立“专章”，香港经济就有了“三大中心”以外的新定位。

这同之前的“十一五”（2016年3月）“计划”改为“规划”密切关联，又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几乎同步。前溯10年，即2001年12月，香港回归4年半

时，中国加入了 WTO；自那时以来 20 年，中国创造了习近平称为具有“长期、平稳、快速”三个特点的经济奇迹，GDP 增速，曾经长期是两位数。这期间香港在做什么？不是所谓“搭车”或“不搭车”，还是习近平的说法符合实际，就是他的“七一”香港讲话说的：“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从未缺席”；他特别提到祖国创造上述经济奇迹的过程中，香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不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回归 25 年以来香港形成了规模和优势，国家从“十二五”起陆续承认和支持的“八大新定位”。

3) 国家规划设立“港澳专章”，是“维护‘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的有机结合。“十二五”起，国家就开始将港澳的经济蓝图，同国家主体的经济规划分开来擘画。完全符合十八大的提法：“要把维护‘一国’原则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不得偏废。”实际是对“一国”之内分行“两制”的两个密联经济体，按照“尊重‘两制’差异”，来分别谋划各自的经济发展。就是说，国家规划经济发展时，由于港澳与国家主体分行“两制”，就不搞“全国一盘棋”了。再说一遍，香港经济不是上海、广东等地方经济，也不是珠三角或长三角等区域经济，这些地方或区域经济都是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香港经济则是同国家主体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香港与国家主体毕竟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地经济发展的任务、目标完全不一样（如 GDP，向为国家主体和其内每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不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目标），确有必要分开谋划。

实际上，“八二宪法”（1982 年 12 月颁布）就已经确定了中国国体一个巨大变化：从“一国一制”变成“一国两制”。随着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基本法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大同”莫过于“一国”，“大异”也莫过于“两制”。国家规划设立“港澳专章”，是尊重“一国”之内“两制”差异的一次重大调整 and 成功实践，香港经济的“八大新定位”得以陆续提出。

“十二五”在“港澳专章”首次提出“三大中心”以外的“一个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十三五”（2016 年 3 月），“港澳专章”又提出了“一个枢纽，一个中心”；“十四五”（2021 年 3 月）的港澳专章，一口气提出了“一个枢纽，四个中心”。香港经济

新定位，就可从这八大新定位切入，加上三个传统优势即“三大中心”，共11个定位，都是“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之所在。

3、香港经济八大新定位（兼谈三大传统优势）

定位香港经济，优先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需要。香港自身发展需要，不是定位香港经济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说，对香港经济的定位，一定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它必须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又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首提的“善用‘两制’之利”中，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利”；只有这一“利”才有所谓“香港所长”，香港对国家的战略价值就在这里。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主体即内地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海浦东和深圳必须做“改革姓‘社’不姓‘资’的标兵”（“标兵”与“先行示范区”同义，今日深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位“先行示范区”）。正因为内地任何地方都不许搞资本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不是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邓小平语），就彰显了“香港所长”。国家需要保留香港这么一个跟世界经济、国际市场“同轨”的小地方，助力国家同世界或国际“接轨”。

国家规划“港澳专章”对香港经济的定位，和对国家主体的经济规划不一样：不是一旦写入规划，就由国家或地方立项、马上投入建设，而是对香港自身已经形成的规模和优势，“港澳专章”只有四个字：“支持”、“发展”。当然，“支持”、“发展”不是说说，必须落实处、见实效。这又显示出“两制”在制定规划上的不同特点：对香港经济的定位，国家不是“重整旗鼓另开张”，而是支持它、发展它，因为它已经有了规模和优势。

1)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这是国家对香港的首个文化定位，因是“一带一路”建设“民心通”的国际平台，国家就采纳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将这个中心写入了确定香港经济定位的“十四五”的“港澳专章”。而且用词非常精准：“支持香港发展”它，而不是重新建设它。因为香港早在2003年起就着手打造，现已有了4个“国际艺文交流”平台：

一是每年4月“香港国际影视展”，早已超过戛纳和洛杉矶，是世界最大影视交易融资市场。二是“香港巴塞尔艺展会”，当代世界顶尖视觉艺术的“巴塞尔艺展会”，在瑞

士以外唯一的展销市场，齐聚全球最大艺术品拍卖行，场地占有率和成交额屡创记录。以上两“展”因新冠疫情暂时停办了2或3年。三是“亚洲内容产业（类似内地“文化产业”：影视戏剧动漫音乐游戏绘画等）峰会”，期间有年度“亚洲电影大奖”。四是“西九龙娱乐文艺区”（简称“西九文化区”），集文化艺术娱乐消费旅游休闲于一体，是目前世界少有的超大型文化建筑群。

国家对港澳的文化政策分别是“中西合璧”、“中西荟萃”；内地文化建设则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香港在海外有两个“文化圈”：“粤语文化圈”和“华语文化圈”。

2) 国际航空枢纽。也是香港自己形成了优势，现在国家承认它、支持它、发展它。按照基本法授予香港的自主航空权：凡是不经停或不往返中国内地的所有国际航线，香港都可以独立自主地去跟国际航空伙伴进行谈判、签署协议。迄今香港已签署了67个航空民用运输协议：120家各国航司客货航班，每周起降4000架次，往返全球220多航点；5小时飞行圈，覆盖了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和数十个主要城市。香港国际机场，已是全球第一航空货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一多层式航空货物处理设施（“超级一号货站”）；它与各国际机场的连通性深度，排名全球第二。

即使“修例风波”期间，香港机场的客运量仍是7000多万人次、飞机起降42万架次。新冠疫情期间，因全球航司暂停客运，香港机场客运量一度下降了97%，但这期间，它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关停的国际航空机场，货运量仍是亚洲第一。特别是今年5月第三条跑道（港称“三跑”）建成后，预计到2035年，香港机场客运量将达1.2亿人次，货运量将到1000万吨。

最近振奋香港的一件事，就是特区政府决定，9月26日起“海外通关”先于“内地通关”：对国外和内地出入境香港，实施不同的防疫政策；比人们预期的还果断：海外通关不是“0+7”而是“0+3”。就是停止了自2020年疫情初起，实施了2年半的入境强制隔离，只需“居家隔离”即“医学监察”；“家隔”时限又超过人们预期，不是7天而是3天，还取消了各国来港航司登机前的“核酸检测”但需做“抗原自测”！

之前所有外国航司，一度因香港入境防疫政策，宣布停航香港；预计香港“海外通关”防疫政策上述调整，各国航司将大面积恢复香港航线。非常利好香港经济的两大国际盛事：“国际金融投资领袖峰会”（全球100多家重要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200多金融界翘楚）和国际“七人橄榄球”赛（3日赛事可带给香港4亿港元直接收入），有望如期于11月上旬在港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说它的“海外通关”优于“内地通关”政策，根据就是香港有两个“显著优势”：不仅“背靠祖国”，而且“联通世界”。这是“七一”香港讲话的名句，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香港是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国际化的。香港医院及卫生局长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内地通关是家庭，海外通关是事业”。

3) 国际金融中心。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香港这个传统优势是否已被新加坡取代？有数据显示：香港的防疫政策，影响了它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首次名落新加坡之后。相信香港调整了海外出入境的防疫政策，情况会有改变：新加坡代替不了香港。

“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银行资本充足率亚洲最高，资产值是本港 GDP 的7.5倍；流动资金率，覆盖了国际监管标准160%；不良资产率只是新加坡的50%。港币是美元唯一有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联系汇率制运行正常，浮动区间稳定。香港证券市场，高深度、高流动性、高效率，总市值是本港 GDP 的10倍。

特别是“修例风波”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0.7%直接流向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外国直接投资中国（FDI）的69.7%，从香港进入内地。进出中国内地的中外资本这两个70%，香港的接盘手或操盘手，主要是强烈要求“海外通关”的3600家跨国公司驻香港的全球或地区总部和办事处。

香港特区政府优于“内地通关”而先放开“海外通关”，就是着眼于这两个70%，这是国家的巨大发展利益。再次证明，特区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以为根据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的显著优势”（“七一”香港讲话），特别是讲话支持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同当年毛泽东决定解放全国不解放香港，邓小平决定收回香港不改变原有制度一样，都是国家所需，都是为了国家最大利益。

也不能把香港仅仅看作中外资本进出中国内地的桥梁，它本身就是一个消化吸收外来投资的全球巨大阵地。香港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额，至今仍居全球第三，仅低于美英，而且没有流出。

4) 离岸人民币全球业务枢纽。引用黄广扬（香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行政总裁）提供的数据：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额，占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额的76%，确是这项金融业务的全球“枢纽”，伦敦等地只是“中心”。曾有人提过，澳门可否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但它的交易额不到全球交易额的1%！所以，不要因为香港出了点事，就动摇了它的基本经济定位。

5) 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香港已经修改了法律，成为发行“保险相连证券”（将保险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和“巨灾债券”的理想地点；跨国公司都可以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并扩大了承保范围；对在香港成立控股公司的跨国保险集团，特区政府优化了直接监管。香港保险业资本充足，渗透率亚洲第二高。香港特区政府鼓励驻港中资企业在港“专属自保”。

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太需要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了：全球50家顶级“政治保险”公司（有恐袭、人质、政变等险种），大约一半在香港有分支机构；“政治保险”同我们内地保险公司的“公共安全保险”是不同的。从香港经济的这个新定位，也能看出香港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外国什么地方或任何内地城市能比拟或可替代的。

6)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是习近平最早提出，最是“国家所需”也最是“香港所长”的新定位。又是一个香港已形成规模、优势，国家果断认可、支持的经济定位，而且是全国唯一。对香港的这个“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结合点的最新定位，不仅内地包括上海、北京或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如深圳、广州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香港当地，知道的人也不多。但在香港的中国两院院士，和有基础科研“国家队”美誉的中国科学院，对此最清楚。

早在2017年6月，24位在香港的中国两院院士，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客观反映了他们在香港做基础科研的优势、困难和要求；9月1日习近平就批复了：“支持香港建成（“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说：“这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3年半后即2021年3月，“十四五”的“港澳专章”写入了香港这个新定位；同是“十四五”，对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定位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是“科技”在前：香港就成了全国唯一的“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我国基础科研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春江水暖鸭先知”：率先提出申请，其所属院所要在香港，这个习近平首提的“创新”在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落户”！

习近平首提、“十四五”确定的香港这个新定位，是有根据的。比如“硬件”，香港拥有全球最先进电信基础设施：连接西方多个科技研发中心如美国“硅谷”等海底光缆，密集度全球之最；供电可靠性：世界最高；网速延迟时间：全球最短等。中国内地通邮海外的全部服务器，均置于香港；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内地理想跳板，等等。

再如“软件”，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研水平：24%世界领先，34%地区卓越，其他均在国际或地区水平。香港仅有8所大学，就有4所在世界排名前50，6所排名前100。香港特区政府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创新中心（“InnovationNode”），是麻省理工首个海外创新中心，就落户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简称“生产力局”）。

香港齐备基础科研的“创新”要素：智权保护水平亚洲最高，全开放国际信息资讯和网络传播，紧贴世界顶级医学科技最新发展，科研人员不限国籍、出入境自由。加之，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两用科技”在香港实行不同于对中国内地（所谓“对华”）政策或管控，特区政府配合检视有关政策执行或管控情况。香港拥有众多各国一流科学家；也是愈来愈多“海归”高端科研人才，回国首选的栖息“凤巢”。香港有45位中国两院院士、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年5月，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调整了香港回归以来涉港澳科研政策：港澳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可不同内地合作，就直接申请国家科研项目；获批国家项目所得科研经费，可全部直接入境港澳，交由申请项目的港澳科学家或科研机构使用。同年8

月，中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首次会议，就批准了中科院所属院所可落户香港；11月，中科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就此签署备忘录。目前已有2家落户香港：“北京自动化研究院”和“广州生物及海洋研究院”：都是AI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国家顶级科研团队！

顺便说一下，香港高校和许多政府法定机构，如香港大学、香港科学院、生产力局、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等，同时也是高端科研企业。它们在这次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就以诸多创新的科学抗疫成果，获得了14项“国际发明奖”，其中4项是金奖。如用于确定是否“围封强检”（类似内地“封控区”但非小区而是楼宇：必须强制检测核酸）的“污水监测”系统，“居家隔离”必须的“电子手环”及其连接政府监测系统（类似孟晚舟“电子脚环”）和必须上传政府疫控系统的“抗原自测”设备等。

7) 亚太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其中“国际法律服务”，就是“七一”香港讲话宣布中央完全支持香港保持的“普通法制度”。这就提示我们，对普通法（亦称“判例法”，俗称“普通人法律”）可能要有个客观、正确的认识。内地教科书和法律界有个普遍观点：普通法不行，甚至同基本法有“抵触”。“七一”香港讲话首提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普通法制度，从香港经济定位的角度看，有深刻战略考量。我体会三点：

一是，普通法是渗透西方全球运行领域的法律体系，经济金融等各个业态发展适用这个法系，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前列的城市，都适用普通法。二是，数百年积累的司法判词都是法律（永久效力），全球普通法法庭均须依循。同“大陆法系”隔三差五地修改或更新成文法不同，普通法没有一份判词是修改过或废除了的，即使是斐济（太平洋岛国）的判词，案例如属同类，香港和伦敦的法庭都得遵循。这就使得最不确定的人类经济金融等活动，依靠熟悉这些判例的普通律师或普通法法庭，有可能准确预判营商环境、减少投融资失误，规避法律风险。三是，法官不限国籍，这是中国内地一些朋友最诟病的，也是普通法区别大陆法系又一特点。中资在海外遇到法律争端，双方都不愿到对方国家去解决，特别是不愿意去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因其法庭一定保护本国政府利益。普通法的法官全是“个体户”，就法论法，中资海外争端多选择普通法法庭。

香港是中国唯一适用普通法的地区，国家利益在香港又有基本法的有力保障：中央保留了解释基本法（简称“人大释法”）的权力，香港法院判决必须依循“人大释法”、终局判决前应提请“人大释法”。因此，某种意义上，保持法官不限国籍的普通法制度，香港就是维护国家在海外巨大发展利益最适合的诉讼平台。即使发生了“修例风波”，香港法庭裁决水平，世界排名仍是第三（低于伦敦、巴黎）。

“十三五”支持的香港这个新定位当中，“争议解决服务”是指“仲裁”，就是不用法律的调解方式。香港是亚太区以仲裁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理想服务地点：其仲裁的裁决可在《纽约公约》150多个缔约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强制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全球排名第一。香港名列全球5大首选仲裁地（低于新加坡、伦敦，高于巴黎、日内瓦）。

8)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作为多份国际知识产权（简称“智权”）协议的缔约方，香港的智权保护水平，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承认，接近西方最高水平的欧盟，超过了新加坡。香港为智权创造者，也就是企业家或市场主体，在初创阶段提供他们急需的融资资源和减免税负的服务，这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简单税制紧密关联。这一点只有香港做得到，也很少有其他城市能够做到，特别是简单税制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智权贸易领先亚洲。

9) 国际贸易中心。就是“七一”香港讲话高度赞誉的：“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香港是9000家各国企业首选的商务据点，全球市场主体均依法自由出入及在港运营。“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如期举办100多场不同类型商品展览：三分之一是全球或地区最大规模；4届香港“一带一路峰会”的现场或线上出席人数，覆盖国家地区数刷新记录。香港是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是它的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传统优势，为任何内地城市难比难替的重要原因。

一是，语言通行全球各业态高端。英文早已不是“殖民地文化”，而是国际金融经贸法律医学科学等业态高端的通行语言。如高峰会议、高端交流和涉“商业秘密”谈判（不通过翻译）；又如全球科学医学创新思路或领先成果，以英文首发于国际权威期刊或

文献。香港的英语普及度，高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文在香港回归后同英文并列为“正式语文”，加上普通话迅速普及，“两言三语”（中英文和普通话、英语、粤语）是港人独有的语言禀赋。

二是，人口构成国际化是中国之最： 外籍人口约60万，占比8.6%，其中欧盟各国公民35万、美国公民8.5万。外国领事馆或国际认可机构125个：62个总领馆、57个荣誉领馆、6个国际认可机构。香港中国公民取得外国籍，只要不申请变更国籍仍是中国公民，但中国境内不受外国领事保护。这利于港商竞夺外国或国际重大项目、香港专业人士取得外国执业资格。他们都可依法申领中国香港护照和港澳同胞回乡证：中国香港护照全球免签国家地区172个，多于中国其他护照免签地域；港澳同胞回乡证在内地30多领域，有内地居民身份证的功能或享有近似待遇。

三是，市场主体国际化堪称全球之最： 欧盟驻港企业约2300家，都是全球总部；美国驻港企业1300家（800家涵盖了美国主要金融企业），283家是全球总部，442家是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美英和欧盟在香港都有海外最大商会。国家《反外国制裁法》不在香港特区实施。

四是，香港税制简单最吸引全球企业家眼球： 直接税只有3项（物业税、利得税、个人薪俸税），税率低且有免税额；利得税率按2级缴纳；税负远低于新加坡；其他各类税项：香港一律免征。香港宜居条件则居世界前列：犯罪率较低、破案率较高（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医疗服务效率排名世界第一（全球评分87.3），人均寿命最高（男82.9岁+女87.95岁）等等。

还有“国际航运中心”这个香港传统优势，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这个香港经济新定位，因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了。

二、着眼：国家始终需要香港，不断成就香港

大家讲香港需要国家比较多，完全正确，也是客观事实。但是思考香港经济新定位，着眼点恐怕要调整。“七一”香港讲话宣布三个“长期”：“一国两制”长期坚持、“香港

独特的地位和优势”长期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就同我们党当年解放全中国不解放香港，收回香港不改变它原有的制度，战略着眼点是一样的：国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

为什么解放全中国（1949年1月），甚至“一定要解放台湾”（1951年1月），毛泽东为核心党中央从来都没有解放香港的决策部署？

为什么实现收回香港这个百年民族夙愿，邓小平为核心党中央在决定“如期收回”（1981年10月）之前3年，就决定了香港“即使收回，原来的制度也不会变”（1978年11月）？为什么国家要用宪法（1982年12月）和宪制性法律（1990年4月）来保障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邓小平要说“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为什么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要将“一国两制”列为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显著优势”并列的，13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简称“制度体系”）之一（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皆无时间上限？为什么香港回归25年时，“七一”香港讲话要将“形象的讲法”，明确为时间延续上没有终点的“长期”？

就是因为国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调整到这个着眼点，就可以理解，不管香港发生什么情况，中央都会用举国之力来成就香港，实际上就是成就国家。

1、香港是中西方关系战略缓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方包括中美关系对撞最激烈的时候，特别是对抗几乎不可调和的时候，香港往往是缓冲地带。这是因为，香港是西方全球经济的运转中心；对美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所谓“结束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只会“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从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53年7月），到整个“巴统”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1949年11月-1994年4月，美西方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物资和高科技的统筹机构），以及长达15年之久的中国“复关”或“入世”谈判，其中涉及“最惠国待遇”（1986年7月-2001年11月），再到“中美贸易战”（2018年6月起），香港在中西方关特别是中美对抗中，都不是较量战场而是战略缓冲。

2、港澳首次纳入国家战略。十八大”以来堪称“重大国家战略”的有7个（“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中2个战略将港澳纳入其中：一是唯一跨国而非跨省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10月习近平首提倡议、2016年3月“十三五”将港澳纳入），国家领导人先后在首届（2016年5月）和第七届（2022年8月）香港“一带一路峰会”演讲或致辞，提出香港有4个独特优势“参与和助力”这一国家战略和4点“希望”。另一是唯一同属“一国”而分行“两制”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纲要》），习近平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中国关税区和港澳单独关税区）和三种货币，列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建设条件”（2018年11月）。

3、十九大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一项战略部署是，中央将港澳正在实践的“一国两制”，写入了新时代基本方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另一项战略部署是，将港澳正在参与和助力的“一带一路”，写进了中共党章（总纲第23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党章收入的“重大发展战略”，只有“一带一路”。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上述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2018年3月，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论坛演讲）。由此可见，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再证香港经济绝对不是地方经济或区域经济，而是“国之重器”！

三、重锤：在港建设姓“资”香港，善用其利

“重锤”，就是按照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年时提出的“两个建设好”和“守本善利”（2017年“七一”香港讲话），必须以有力举措和政策，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就是本论坛主题的香港经济新定位，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两个建设好”和“守本善利”

1) “两个建设好”。习近平首提：“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要有这个信心”。这段话在我党开创和领导的“一国两制”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性质：它标志了“一国两制”不仅是统一祖国的方针，也是建设祖国的方针；它告诉我们，国家对香港不仅“主用”，而且“主建”；香港对国家来说，也不再是“客场”，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场”。邓小平早就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就是“一国两制”。他还说过：“为了发展，我们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习近平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不仅是“容忍和鼓励”，而是“建设”，还要“建设好”！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时代就有的勇气、胆略和政治定力：

“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语）！

“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世界历史没有过”，“西方也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做过”（邓小平语）！

“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过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习近平语）！

2) 国家主体必须姓“社”，香港必须姓“资”。“两个建设好”与邓小平强调的“一国两制”必须“讲两个方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邓小平对“两个方面”的分析非常透彻：

一方面，国家主体即内地若不姓“社”而姓“资”，就会“两极分化”、“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起来闹革命”、“全国动乱”；就会出现“世界性难民潮”；香港繁荣稳定也会“一风吹”！

另一方面，若“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或“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简称“一来一去”），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政治上“发生武力冲突”、“造成混乱局面”；经济上是“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

3) “守本善利”。习近平说：“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也同邓小平的以下论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善用‘两制’之利”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利”，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人们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有三个“优越性”：“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三个制度优越性，香港一个都没有，也做不到。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利”到底在哪儿？而且要“善用”，的确是个崭新课题。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是在内地再建设一个香港，或在内地什么地方去“善用”资本主义之利吗？按照邓小平上述透彻分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眼光、脚步、投资的重点全部落到香港去。就是说，只有在香港依法“建设好”资本主义的香港，才能找到并发挥香港资本主义这一制，对我国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这国家主体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之处。

2、在香港建设好姓“资”的香港，才能“善用”资本主义之利

1) 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中科院，这方面已走在前面了：内地优于香港的科研资源（国家科研经费）开始入境香港；内地优于香港的科研力量（中科院所属院所）开始落户香港。前者有助缓解香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特区政府给香港8所大学三年科研经费的总和，不如中央政府给某内地大学一年科研经费多）；后者有助使用香港独有的基础科研创新亟需的“硬件”和“软件”（基础科研“国家队”落户香港，就可分享基本法中只适用香港特区的各项政策）。

2)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们也做了成功探索：一是，总体设计交给香港来做（香港的国际设计师有内地包括国家设计团队较难有的国际视野），就有了中央对大桥的高度评价：标志我国从“桥梁大国”已成“桥梁强国”（设计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桥梁标准）；二是，工程建设靠内地施工团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劳动模范”激励（香港任何施

工团队都做不到)；三是，同一水域三个法系，不照搬内地政府要求的“法不授权不可行”，在香港水域善用普通法（既有利工程推进，又规避法律风险），与香港特区政府默契合作，如期完成了建桥工程。

3) 内地香港互学互鉴：力免“南橘北枳”；内地支持或援助香港：宜“以鸟养鸟”而非“以人养鸟”。习近平说：“积极探索、创新符合本地实际的开放模式和经验，尽量避免出现模式和政策移植导致的‘水土不服’和‘南橘北枳’现象”（2016年8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南橘北枳”，参见2000年前大战略家晏婴的说法：“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今天，我们观察香港情况，切忌用内地眼光或套用内地标准；支持或援助香港，切勿照搬内地做法。借用2000年前大思想家庄子的智慧，“以鸟养鸟”：鸟存；“以人养鸟”：鸟亡（《庄子·至乐》）。

3、一些建议：

1) 参照香港回归前10年起，中组部就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在深港两地连续举办全国厅局级干部读书班，邀请香港工商专业界专家详介香港优势的做法，尽快开展“三方培训”：内地方（有“走出去”愿望、产能和技术实力）、香港方（国际融资和专业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方（本国的安全、盈利项目）互为师生的项目培训，相机“拼船出海”。

2) 在香港建立一个同内地推动“一带一路”的“三国家”（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国家项目）投融资机制并行不悖：“三国际”（国际资本、国际化专业服务、国际项目）的投融资机制，善用“香港所长”，不只是“参与”，而且是“助力”这个国家战略“高质量发展”。

3) 央企、国企、民企和香港中资，聚焦国家赋予香港经济的11个定位，在这些“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大规模投资或政策倾斜。不光是利用香港，而且是建

设香港；不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而建设一个真正资本主义的香港。赞同梁定邦（国家证监会首席专家、香港证监会原主席）的建议：不在香港产生盈利的跨国金融活动，豁免缴税。

4) 香港中资在港盈利，恢复回归前的政策：主要用于香港本地。就是参照基本法第116条，香港特区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政府”。这个“自身需要”，既是国家需要，也是香港需要。香港中资可与特区政府和香港商界深度合作，重点在香港而不是在内地，更不是在大湾区的任何内地城市，全力解决香港青年的上位（就业）难、上楼（住房）难、上流（发展）难问题，落实“七一”香港讲话的“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5) 内地企业参与香港“再工业化”战略。同时注册为香港企业，善用特区政府对香港企业参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资助政策；善用香港当年是“世界工厂”时建设、至今闲置的政府场地；加入香港在中央支持下自回归以来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43个国家或地区），与香港当地的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陶冬：短期地位难以取代，定位坚持双轮驱动

陶冬 瑞信亚太区私人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陶冬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53 期）上的发言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难以撼动

我从财富管理的角度谈一谈对未来香港经济的定位。最近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中心地位上的此消彼涨，我正好去了一趟新加坡，见了许多超高净值客户。我的感受是，近段时间去新加坡开户、建立家族办公室的人特别多，家办审批等程序起码排队六个月才能搞完，真正把架子搭起来可能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说明，新加坡的确在建设金融中心上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根据国际咨询机构 Henley&Partners 的数据，去年全球财富流动中，新加坡净接受了 26% 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一个金融中心来讲所取得的成就是大的，而香港出现了市场份额净流出。

从这个基础上来说，新加坡最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 GDP 或者旅游、投资等各方面，都比香港好。但新加坡在建立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短期内未必可以撼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人才不足

这不仅仅是有金融知识的人才够不够的问题，还包括低端的、做辅助性工作的人的工作态度、主动性，以及在思想上是否有一些有创意的投资方式和理念。这个问题新加坡一直有，是成为一流金融中心必须要解决的。

2、交通便捷度不够

金融机构做调研，去纽约、伦敦的时间非常长，去中国的时间也非常长。新加坡飞上海需要六个小时，而且一天只有几班航班。而香港正常情况下一天有二十多班的航班，

两个小时就能到上海。

3、金融文化不足

新加坡的雪茄吧很少。这种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对冲基金，甚至家办们交流投资意见，除了在正经开会时，还有很多时候是在下午收市之后，大家找一个地方天南海北地聊。香港这种地方很多，从兰桂坊到文华酒店，雪茄吧非常多。受到过去新加坡的投资方式和氛围的影响，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于投资很重要的基础设施还需要时间来建立。

新加坡的金融发展在未来大有希望，但我不认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么快就可以被撼动。我们不要用一个季度、一年甚至几年的数据来做判断，对于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也要有同样的思想准备。

新加坡做得最好的是外汇中心，这一点香港比不过它，东南亚有十几个国家的汇率都在新加坡做。由于过去很多年，人民币汇率和港币汇率动荡不多，香港的外汇中心建立不起来。对比新加坡和香港外汇中心的成交额，香港的确有差距。

最近新加坡在家办上面有很大的突破，但长远来讲也需要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与此同时，香港不要妄自菲薄，它有自己的竞争力的优势。

二、竞争对手来势汹汹，未来香港何去何从

未来香港能否保持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要看以下几点。

1、务必要与国际接轨，而不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

2、务必要保持人才优势

既要有高端人才优势，也要有低端的人才优势。同时，要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的资本市场体系。香港在做 IPO 上可以，但是如果要做创科中心，除了 IPO 和二级市场之外，

对于如何向初创企业和起飞期企业提供资本支持，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

3、务必要保持国际水准，避免内地化

1) 未来的定位受到四重因素叠加影响

香港正在四个不同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经历一次巨型的转变，包括经济周期、政治演变、经济转型和中美博弈。在四重因素叠加作用下，来看香港未来的定位：

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的调整、美国货币政策、中国经济转型和疫情等，非常复杂。目前看来，由于疫情政策的调整，最坏的时间可能过去了。

政治演变上，在香港的定位上，《国安法》、政治稳定等等，也慢慢开始有了。中国的香港这一点无可厚非，也是必须要做的。

经济转型上，香港过去有四大产业，现在只剩下金融一枝独秀。此外，香港本身的营商成本变得越来越贵，房地产价格、租金水平都在上升，老龄化问题也在加剧。

中美博弈、地缘政治也使得香港成为一个“磨心”。

除此之外，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也是香港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果要改变房地产一枝独大、金融业苦苦支撑的现象，一定要把产业和创新之间联动起来。香港的科研能力不弱，但是为什么最后都跑到内地去发展，值得仔细研究。

2) 务必坚持双轮驱动

在香港的定位上，双轮驱动是必须的：一是中国的香港，二是国际的香港。与内地紧密结合，和坚持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两点不可缺一。同时，打破地产垄断，向金融经济、创新经济、服务经济转型，这个定位方向上应该是很清晰的，但是困难也一样多。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之间毕竟有许许多多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既包括经济结构上和认知上的差别，更包括了基础设施上的差别。港珠澳大桥建起来之后，一是和深圳

没有接上，二是车流量低，这就凸显出美好的理念和现实间的差别。香港传统优势在下降，包括金融优势，比如这次抗疫政策使得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4、香港政府“水土不服”，政策落实面临挑战

香港公务员有自己的提拔体制，这有很多好的方面，但对于内地的了解、认同和相应的处事方法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有些事情未必是中央政府出一个政策支持以及香港政府一个宣布就可以做的。在未来落实执行上，会很考验香港政府的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和政治意愿。

5、前路漫漫，信心不减

对于香港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个人是有信心的。我认为，使得香港保持金融中心，必须要依靠祖国、依靠内地。只要香港有足够的 IPO 需求，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会消失。但是与此同时，香港必须要坚持和国际接轨，这不仅包括与国际资金接轨，也包括了国际的基础设施，包括国际会计标准、法律标准和监管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香港也在向这方面努力。大湾区的融合是有条件的，但是未来还有许多曲折，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在哪个地方画个圈就可以建起来的。毕竟香港很难像浦东、深圳一样，给一个政策，再把国内的资源全部堆起来就可以做到，香港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至于创新经济，我个人认为，香港可以做，但是香港的经济结构、人才结构注定了它起到的是辅助角色。如何把香港和深圳，甚至大湾区有机结合地起来，错位发展，是未来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总体来讲，我对香港经济充满了信心，对于香港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信心，但是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乔虹：预期香港明年 GDP 增速 4%左右，风险与机遇并存

乔虹 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以下观点整理自乔虹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53 期）上的发言

一、防疫政策逐渐宽松，交通枢纽作用有望恢复

我从投行角度，特别是以香港为基地的投行角度，集中分享一些香港中短期的内需、外需方面的看法。

一个月前，我们刚刚调降了今年香港 GDP 增速预期至-1.5%。今年香港会出现一个持续衰退的状态，这不是一个太大的新闻。从整个市场平均-0.1%的角度看，这个想法并不是特别悲观，但比其他市场中的竞争对手方更加谨慎。

这个想法主要原因来自于，上半年香港经济状况比较低迷，尤其是一季度消费情况作为 GDP 增速的一个比较大的拖累，一直对上半年经济起到负面影响。直到疫情政策逐渐放开，2、3 月份大家非常紧张、基本人人在家工作、全城几乎接近静默的状态逐渐有了恢复和好转，在二季度有了一些数据的反弹。到了三季度 7 月份，特别是在 8 月份发第一批消费券之前，零售数据显示消费确实有所进步。7 月当月零售受到了奢侈品，主要是首饰珠宝、手表等推动，光是奢侈品的推动就导致单月出现了 28.8%的巨幅增长。虽然我们认为，这种增长受到一些一次性因素和低基数因素的影响，不太可持续，但是这让大家突然看到了希望，觉得下半年经济可能会出现比较好的反弹。但是，现在根据反弹的结构来看，短期内出口、服务业和消费不太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修复。所以我们认为，今年的增速还是低于市场平均预期，但对明年，我们的预期高于平均。虽然香港不能一下子实现经济活动转型，金融中心地位的马上回归和科技职能的发展，但是明年还是有很多因素可以在短期内看到一个更好的表现。

1、对外限制减少

从香港跟世界接轨来讲，疫情防控政策从之前的“酒店三天隔离，回家四天的医学监测”的状态，变成现在的“0+3”，并且从9月26日就开始执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市场预测可能在11月左右就会实现“0+0”，如果是这样，确实会对交通运输和入境旅游业有比较好的促进，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2、对内贸易修复

香港与内地间的运输从7、8月份开始出现一些好转迹象。如果把香港对全世界的出口，同中国内地对全世界的出口两条线画在一张图上，会发现它们一直非常接近。但今年一季度开始，两者突然出现了大幅背离，内地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增速远高于香港，香港的下滑非常严重。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就是不能通关，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交通枢纽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之前有诸多的跨境货车带来疫情隐患，以至于深圳很大幅度地提高了检验标准，使物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现在都已经在好转。

明年还是有希望能够看到在中国整体防疫政策放松的基础上，香港能够走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所以我们对香港明年GDP增速的预期是高于市场的，市场目前预期不到2%左右，但我们觉得能有4%左右的增长。

二、风险与机遇并存，对香港经济保持信心

1、风险：外需不足+金融条件恶化

2023年看香港，有几点风险要给大家做个提示：一是外需，二是金融条件。

从全球目前的外需状况看，预测美国明年前三个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我们会看到一种硬着陆状态，但不会特别硬。美国的硬着陆会引起它的政策变化。现在看美联储基准利率最终到4.75%-5.0%，在未来11月份会看到75%，接着是50%，明年2月、3月各25%，这个水平已经比原来想象的高很多了。美联储已经明确表示要抑制需求发展来控制通胀，这就会导致整体的失业率上升，我们认为到明年年底美国失业率会达到5.6%。

如果到明年年底，美国的需求进一步恶化，最终可以带来美联储的降息，就有可能在短期缓解香港金融条件的压力。在这之前无论是外汇还是利率，短期内压力都只会继续向上攀升，而不会下降，这是第一个风险。

很多人说联系汇率会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我们觉得这不会。从发钞行和金管局的准备情况来看，buffer 还是比较足的。要提防的风险可能是制裁（Sanction）的风险，如果对某些在港金融机构进行美元相关的制裁，可能会影响到投资人的信心。

除了美国的硬着陆之外，我们预测主要经济体，美、日、欧在未来几个月内都要进入衰退，因此外需也可能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明年要担心的主要外部环境风险。

2、机遇：与内地通关恢复+购房政策宽松

疫情防控措施逐渐放开，会使得香港和国际重新接轨。无论是“0+3”、“0+0”，还是做到什么程度，对香港本身的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对香港经济最大的促进来自于通关，而不是香港对海外防疫措施的放松。**如果对内地其他城市的通关能够在明年一季度开始逐渐放松，明年下半年就能够进入一个不需要隔离的状态，对于香港的服务业、餐饮、旅游都会有特别明显的促进。毕竟在疫情前，国内的游客占香港游客总数的 60%，总花费的 80%，这是非常大的基数。如果这个地方不开，只指望海外，是没有办法恢复这些行业往日繁荣的。

此外，对海外放松之后，可能有更多的香港本地居民想去海外旅游，替代了在香港本地的消费，也会增加服务业等的进口，这样的影响对 GDP 来说未必是好事。所以短期来看，对某些航空业是有帮助的，但其他的方面对 GDP 的正贡献是有限的。

最后，房地产政策的变化也可能是好消息。之前港府用各种方法来抑制香港房价的持续上涨，主要通过让没有香港身份证的人买房变得更加昂贵，即使换成公司户口和其他的方法，也是要增加税收。现在美林的观点是预测到年底，楼价相比年初会下降 10-15%，这是非常大的空间，明年可能会继续降。这种程度下香港的购房政策可能有一

定幅度的放松。如果能够借着和内地通关的契机，大陆有大批愿意投资海外房产的人可能会来香港购买。这可能是短期政策上比较正面的潜在好消息，不过对这一点不能抱太高的希望。

总体来说，对于明年，我们有理由变得乐观一点，因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比较乐观的估计。这种乐观估计主要基于我们认为，在开完二十大之后会看到防控政策逐步放松，经济活动逐渐走向正轨。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点，我们对香港经济也是保持信心的。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